
太平洋战争前十年间 英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和政策

萨 本 仁

本世纪 30 年代初至 40 年代初, 英国在远东对日本, 在欧洲对德国, 在地中海地区对意大利奉行全球绥靖战略, 而对日绥靖的起始早于对德、意的绥靖, 终结也晚。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英国实行旁观袒日的政策, 纵容日本侵华。欧战爆发后, 英对日绥靖更变本加厉, 策划东方慕尼黑阴谋, 妄图牺牲中国民族利益, 实行对日妥协, 以避免或推迟其与日本的直接军事冲突,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考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和政策, 对于弄清中日战争前期远东复杂的国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

九一八事变震撼了国际社会, 西方主要国家与苏联在这一严重事端面前, 都无法回避确定自己的立场和对策。一向在华利益最多的英国, 当然更为关切。当时英国正经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困扰, 对华关系主要偏重于贸易方面, 它对我国领土主权受损并不关心。^① 而且, 英国早已认为“满洲”(东北地区)是日本的“势力范围”, 因而除佯作姿态外, 并不准备做出任何积极有效的反应。^②

1932 年 1 月, 以英人李顿为团长, 包括法、美、意、德等国代表

① 柯伦特:《史汀生国务卿》(Richard. N. Current, *Secretary Stimson*), 新泽西 1964 年版, 第 89 页。

② 托因比:《1932 年国际事务概览》(Arnald. J. Toynbee,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2*), 伦敦 1933 年版, 第 516 页。

组成的国联调查团，经一个半月的实地调查后，完成了一份调查报告，于 10 月 2 日公布。报告书的基调尽管判定日本的侵略行为违反了九国公约及非战公约，然而却建议以主权归中国，利益归日本的方式组织国际顾问委员会管理东北事务。英国在国联的地位和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报告书显然也反映了英国对九一八事变的立场和政策。11 月 1 日，日本正式发表拒绝接受国际共管东北事务的声明^①，1933 年 3 月 27 日又悍然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此后国联对日本再无任何约束力可言。

日本在侵略我国东北的同时，还对中国和英帝国主义远东的成员国采取倾销政策，以转嫁经济危机的灾难。中国人民掀起了广泛的抵制日货运动，英国迫于日本工商财阀势力的争夺排挤，1933 年 4 月宣布废除印日商约，加征输印日货输入税以进行抵制。《塘沽协定》后，日本的侵略势力已伸展到长城以南，严重威胁英国在华北的利益。1933 年初，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英国更不得不重新估量国际形势。1933 年底至 1934 年初，英国国防委员会下设的国防需要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期间，外交部常务次官范西塔特 (Vansittart) 认为：“我们的资源……不足以对付同时来自日本和德国的威胁”，而且“这两者中德国是更大的威胁”。^② 英国外交部也认为，英国不应该因东北事变而反对日本，英国在满洲的利益相对不太重要(除贷款外，英国在东北的投资还不足 600 万英镑)，因而确认“远东形势的全面改善，基于在满洲满足日本的扩张要求。”^③ 1934 年 3 月 14 日，在内阁讨论国防需要委员会的报告时，财政大臣张伯伦 (Neville Chamberlain) 在强调军备扩张受到财政状况的制约后，建议政府与日本缔结一份为期数年，并就日本对华态度英国作出某些保证为条件的英日互不侵犯条约，以保证英国

① 方乐天：《东北国际外交》，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第 80 页。

② 佩尔兹：《奔向珍珠港》(S. E. Pelz *Race to Pearl Harbour*)，剑桥 1974 年版，第 104 页。

③ 《英国内阁档案》微缩胶卷，CAB24/248。

将注意力更集中于靠近本土的正在发展中的严峻形势。^① 外交大臣西蒙(Jahn Simon)等赞成张伯伦的建议。接着,张伯伦又提出英日两国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建议。4月16日他在内阁会议上称:“当我们在(中国的)一个地区自由提供资本的时候,我们难道不能让你自由地在(中国的)另一个地区提供资本吗?”^② 然而,正当张伯伦等人向日本频送秋波的时候,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抛出了一份旨在排斥英美在华势力、关闭中国门户,将中国视为其独占殖民地的狂妄声明。尽管“天羽声明”对张伯伦、西蒙是个打击,但是他们却仍以为是因对日妥协退让不够而致。10月16日,他们二人提出了一份《关于英日关系前途》的联合备忘录,认为英国只要“政治绥靖”日本成功,就“毫无疑问地会从与日本的有保证的友谊中获得巨大的利益”^③,为此就要对“满洲国”作出事实上的承认。但是,仅此已不能满足日本的要求了。当英国面对来自东西方敌人的威胁,自感软弱却又不肯拿出重金重整军备以图自振时,日本却在进一步扩军备战。日本海军在陆军和右翼团体的支持下,1934年9月决定单方面废除华盛顿海军条约。^④ 这就是说,日本决心要不受限制地发展海军。由于1934年底日本单方面宣布废除华盛顿海军条约,1936年初又退出伦敦裁军会议,尽管张伯伦关于缔结英日互不侵犯条约的主张未能实现,英国却并未因此就终止“政治绥靖”日本。相反,1936年至1937年间英日又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谈判。英国指望通过谈判与日本签订一份政治协定,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范围和在华北的“特殊地位”,以换取日本的侵略步伐止于华北不再继续南下,使英国在长

①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集》(*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第2辑第20卷,伦敦1984年版,第187—188页。

② 特兰特:《英国与东亚1933—1937》(Ann Trotter, *Britain and East Asia 1933—1937*),剑桥1975年版,第54页。

③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集》第2辑第13卷,第61页。

④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06页。

江流域和华南的既得权益不受危害。虽然，卢沟桥的炮声并没有将英国从绥靖日本的迷梦中惊醒，可是漫长的英日谈判却无疾而终了。

二

中日战争初期，英国对中日两国积极策划“调停”，力求尽早结束中日战事，减少因战争给英国在华利益带来的损害。在调停中日和谈活动中，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走在了前面。而此时张伯伦政府则主张通过国际会议谋求远东停火，反对国际社会对日本进行任何制裁，理由是，制裁可能导致日本对印度的石油供应地或香港进行报复。英国的打算是“与美国齐步前进，步伐一致，不前不后”。^①它企图让美国出面“调停”，早日结束中日战事。然而，美国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这时尚未打破，既不愿率先介入，也不愿承担任何国际义务为英国火中取栗。假手他人既然不成，张伯伦只好亲自出马“调停”。据时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所获情报报称：“英国政府自艾登外相解职后，首相张伯伦曾拟定一种调解中日战争和平方案，其内容计分三点，即：一、日本于平、津留驻少数定额军队外，所有在华日军，扫数撤退，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二、日本留驻华北等地特务机关完全撤销。三、上海所属南市、闸北两地划为日本租借地。”^②显然，张伯伦关心“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是为确保英国在长江流域或华南的利益。

但日本骄狂至极。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竟然宣称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要扶植“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调整”日中邦交。^③同日，日本外

① 《艾登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960页。

②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0页。

③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940—1945)》下卷，第386—387页。

务大臣广田在国会承认该声明比宣战更为强烈。2月11日，张伯伦在各部大臣会议上表示，他“一刻也不愿有人认为所有与日本绥靖的机会都已过去，重要的是还要向哪些方面作出某种努力”。^①的确，张伯伦政府为此是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的。

1938年1月1日及18日，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两度访晤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指出美、苏已开始援华抗日，中国政府希望英国效法。艾登表示英国将量力而行，并许诺必要时英国可派舰队援华。^②3月28日，立法院院长孙科偕郭泰祺访晤艾登时提出：“我方所切望于英方者为财政援助。”艾登称：“因问题复杂，又值欧洲多事，致未能决，现仍在研讨中。”^③其实，张伯伦等人此时仍坚信只要继续实行对日绥靖，即可维护英国利益，无需援华。更为严重的是，1938年5月2日英国与日本还在东京非法签订了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④同日，英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 Kerr)函告蒋介石，英日拟即成立关于中国海关问题的协定，希望中国政府合作不要阻挠。^⑤次日，英籍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F. Maze)指示英籍江海关税务司恩索尔(E. N. Ensor)，按协定将以后征收的税款一律存入日本正金银行。但日本并不满足于该协定，借口过去积存在英国汇丰银行的税款没有移交给正金银行，对日庚子赔款没有照付，因而拒绝按协定从占领区各关税款中划拨偿付外债和赔款。此外，日本早已觊觎英国长期把持的中国海关大权，全面侵华后，更就中国海关税款、人事等方面胁迫英国就范。果然梅乐和“委曲求全”，采取“灵活措施”，招雇了大批日籍人员，致使日本得以攫取大笔中国海关税款，套取外汇，向欧美各国购买战争物资屠杀中国人民。

① B. A. 李：《英国与中日战争 1937—1939》(B. A. Lee, *Britain and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牛津1973年版,第102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第2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4页。

③ 同上,第27—28页。

④ 《一九三八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页。

⑤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第2册,第96—100页。

中国人民对此极为愤慨，国民政府外交部立即向英方发出照会，声明中国不受该协议约束，保留对海关的一切权利与行动自由。^①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11月4日，蒋介石在长沙向卡尔指出：日军占据广州，虎视香港，给予英国在华利益以致命的打击，中国政府亟盼英国在其远东政策的成败关头积极表态，否则日本必将完全取代英国在华地位。蒋介石还表示，亟欲了解英国是否愿意对中国抗战提供经济援助或其它援助。外交部长王宠惠接见卡尔时力劝英国对日采取积极政策，勿再迟疑。^②卡尔当面答应向政府建议，可是抵香港后，又扬言假如日、中都能自动接近，英国当然是很乐意充当“调停者”的。这时，国民政府向英国晓以利害，力争其援华抗战，以备日军一旦攻取英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时，中英美三国能有军事合作的基础。同年9月1日，郭泰祺大使拜会英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E. F. Halifax)，受命声明中国将在国联第102次行政会议上要求履行国联盟约第17条，要求对日经济制裁。^③当时英国政府正与德国进行慕尼黑交易，在东京进行的英日谈判也胶着不前。如果讨论对日经济制裁，势必影响到英国对德日绥靖政策，故而哈里法克斯对郭泰祺说，中国政府这样要求“于中国自身没一点好处，而对国联可能有害处”。接着，他又向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表示，英国政府是不会赞成中国要求国联制裁日本的。^④

1938年10月起，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一举灭亡中国的计划已成泡影，因而加紧对国民政府政治诱降，此时，英、美仍想“调停”，策划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劝使国民政府与日本“议和”，以换取日本对英美在华利益的“谅解”。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

① 《抗战建国六周年纪念丛刊》，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6年版，第36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第2册，第29—30页。

③ 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7页。

④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集》第3辑第8卷，第58—59页。

反对，“太平洋国际会议”未能召开，远东慕尼黑阴谋终未能得逞。

1939年2月，日军攻占了海南岛。蒋介石再次吁请英国对日采取行动，维护中英在远东的共同利益。但英军总参谋部却认为，目前采取军事行动尚嫌过早，况且英国不能不首先重视欧洲问题。关于中方提请派遣义勇军来华助战问题，如果英日已在作战状态中尚可行，然而眼下尚未如此。^①此外，国民政府为稳定国内经济，多方求助，宋子文、郭泰祺一再向英方商借款项。1939年3月，英国内阁决定，除上年12月9日允诺从出口担保法案规定由商务部支配的1000万英镑中，拨借中国300万英镑外，仅答应再借给中国平衡外汇基金500万英镑。^②

1939年4月9日，伪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遭暗杀。日方以凶手潜入英租界为由，声言英租界是“抗日分子的庇护所”，这一事件是“对东亚新秩序的挑战”，要求英租界当局引渡“犯人”，遭英方拒绝。在日方压力下，英方建议谈判解决双方在华北的利益冲突。7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与英驻日大使克莱琪(Craig)代表双方政府进行谈判并在东京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③协定规定：英国在华北限制抗日活动，阻止“抗日嫌疑犯”进入英租界，削减英国在华北的驻军。1940年6月又将《协定》达成的原则具体化，英国终于接受了日本在华北的独占地位，日方同时取消对天津英租界的封锁。针对张伯伦政府在英日谈判中妥协退让的立场，中共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一致反对张伯伦对日妥协》，揭露“日本用这些威胁的手段，迫使张伯伦在远东迅速重演他原有的‘慕尼黑’老把戏，同时迫使英国由‘援华制日’而彻底的转变到‘援日制华’的道路上”。它还指出：“张伯伦的‘现实外交’只有助长侵略，把目前局部的、片面的战争扩张为全世界的战争。”^④英方执意对日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第2册，第31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第2册，第211—213页。

③ 《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35—1945)》，北京外交学院1957年版，第8页。

④ 延安《新中华报》，1939年8月11日。

妥协，8月英方将程案4名“嫌疑犯”引渡给天津伪政府。英方此举既违背国际公法，又是变相承认伪政权，因此国民政府外交部及驻英大使馆分别向英国外交部及驻华大使馆提出严重抗议。^①

这时，英国对对华经济援助依然持消极态度。8月10日，郭泰祺大使奉命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促请增援平衡基金1000万英镑，以维持日益动荡的法币的稳定。艾登口头答应将认真考虑，但16日英国外交部却照会郭泰祺大使，托辞延期增拨款项。8月29日，财政大臣西蒙干脆向艾登表示，英方难以再借款给中国维持币制，艾登遂致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转达西蒙的意见。^②

三

中日战争转向持久战后，日本对国民政府加紧政治诱降。1938年底，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策划建立南京伪政权。日本一方面以日、德、意已结成军事联盟对英国威胁，另一方面又打着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幌子，排斥和抢夺英国在华利益。但张伯伦却认为“远东的事态与欧洲的事态紧密关联，当考虑我们的立场时，必须与大不列颠家门口的局势密切联系起来”。^③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12日，蒋介石电饬郭泰祺大使转致英国外交部，指出如果欧洲的战事持续下去，日本迟早会乘英、法无力东顾的机会，攻占其东南亚的殖民地。中国政府亟愿了解英国政府今后对华政策是否还信守国联盟约，是否愿意与中国多方合作，订立对日防卫的秘密协定。^④6天后，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贾德干(Sir Alexander Cadagan)淡然答复国民政府外交部称，英国当然始终履行国联盟约，而且英国不能忽视在远东与美国采

^① 《抗战建国六周年纪念丛刊》，第37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第2册，第217页。

^③ B. A. 李：《英国与中日战争 1937—1939》，第165页。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第2册，第32页。

取平行措施的必要性。至于中英军事合作问题他却不置一词。^①

日本趁欧战爆发，乘机对英国在华利益步步进逼。1940年初，日本为攫取国民政府存储在天津英租界交通银行的白银再次对英国施压，日军封锁了天津英租界。对于日本的无理要挟，英国竟然不仅不采取任何对抗措施，反而表示愿与日方协商，胁迫国民政府就范。卡尔大使居然说，如果中国坚决拒绝的话，英国政府就要保留其“行动自由”，采取必要步骤以保护“自身利益”了。在英国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改由第三国银行保管该批白银；以该批白银的一部分换购英汇存储在伦敦；中国政府愿以相当数额的中国法币战后交国际团体，充赈济天津英侨为此受难之用等变通办法。^② 同时，国民政府向卡尔大使郑重警告：中国政府对英方不顾我国利益与日本妥协甚表愤慨，倘英方不顾我方反对而径自行动的话，我方将认为这是不友好的举动，我方提出的变通办法已经是可能做出的最大让步。^③ 最后，英国仍因慑于日本的压力，无视我方警告一意孤行，与日本达成“共管”该批白银的协议，换取日军解除对天津英租界的封锁。

1940年4—5月间，欧洲战局发生急剧变化，德军横扫西欧、北欧诸国。6月，德军直捣巴黎，绥靖政策的恶果暴露无遗，严酷的现实已经宣告了“绥靖战略”的破产。但是英国当局并没有从中汲取惨痛的教训，相反，这个时期远东慕尼黑阴谋却发展到了顶点。英国对德宣战后，议会曾就对中、日政策进行审查和辩论，政府中相当一部分人仍死抱住对日绥靖政策不放，甚至呼吁英日友好，恢复英日同盟关系。法国败降后，德国在欧洲更加得手，助长了日本南进攻取东南亚，独霸亚洲的侵略野心，英日矛盾的激化势难避免。日军南进的首要目标是印支半岛诸国。6月20日法国贝当傀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第2册，第33—34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第2册，第107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第2册，第109页。

儡政府与日本签署包括关闭滇越铁路(越南段)在内的法日共同声明,从而阻断了由越南海防港输往云南昆明的各种货物。这样,援华抗战物资的国际通道就仅剩下滇缅公路了。滇缅公路自云南昆明至中缅边境畹町段,全长 959 公里,1938 年 11 月全线修通,每月经由此路输入中国的货物多达 4 千吨。^① 为阻断这条援华物资的唯一国际通道,日本利用英军刚刚受挫的有利时机,公然提出封锁滇缅公路、香港边界以及从上海撤离英军的无理要求,否则马上对英宣战。国民政府外交部训示郭泰祺大使,尽力阻止英国政府再次对日妥协让步。然而,英国政府还是借口英日如果发生冲突,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属自治领必然首先蒙受其害;7—9 月正值雨季,道路泥泞,滇缅公路运输量也较少,即使封锁影响也不会很大等“理由”,对日妥协,决定从 7 月 18 起封锁滇缅公路 3 个月,禁止通过缅甸向中国运送军用物资。英国担心缅甸和香港的安全,它对于远东的殖民地鞭长莫及,唯恐触犯日本自己吃亏。为掩饰对日妥协的本质,7 月 18 日丘吉尔首相在下院的报告中竟然声称,(英日)此项协定的目的是希望在停闭运输期间找到一种“公允的”解决办法,使中日“双方均可自由接受”。^② 同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抗议声明,指出:“如有人以为中国通海贸易路线受有阻梗后,中国即将被逼求和,或竟接受日本所提出之任何条件,实为最大错误之判断。”^③ 显然,这时丘吉尔在对日政策方面仍是沿着张伯伦的绥靖路线往下走,他要待美国的态度趋于明朗后,才在亚洲共同抗衡日本。英国政府再三向国民政府保证,3 个月后情况好转,将不再延长封锁期限。

封锁滇缅公路后,中国完全失去了外援的通道。7 月 28 日蒋介石致电丘吉尔,在谈及抗日战争是中英两国共同利益所系时,指

① 《现代国际关系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31 页。

② 《温斯顿·丘吉尔演讲全集》(Winston Churchill His Complete Speeches)第 6 卷,纽约、伦敦 1974 年版,第 6252 页。

③ 《抗战建国六周年纪念丛刊》,第 37 页。

出：“唯有中国战胜并保持独立，英国在远东的利益方能保存，故余迫切的声明，请阁下为贵我两方利益计，从速恢复滇缅公路运输路线。”^① 9月13日，郭泰祺大使再访贾德干，促请尽早重开滇缅公路。英方表示，英德战争正酣，英国本土受到严重威胁，待德军攻英势头受挫，英国承荷的军事压力有所缓解后，方可重开滇缅公路，此刻英国不能也不愿在远东再树日本为敌人。^②因此，国民政府只能寄望于英日关系的恶化了。

法国贝当政府封锁滇越铁路后，日军侵入越南，威胁缅甸，继而又于9月27日与德、意正式结成军事同盟，形成与英、美的军事对抗局面。随着战争形势的日趋明朗，出于维护英国自身的生存和利益，英国政府才不得不调整其对日政策，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1940年9月30日，英国政府宣布继续支持重庆国民政府，否认南京汪伪政权。10月8日，丘吉尔在下院报告战争形势时承认：“英王陛下政府同意关闭滇缅公路迄于10月17日的协定，不过此后他们（按指日本政府）未再试图续订协议。”^③ 丘吉尔在下院正式宣布政府已决定如期重开滇缅公路。次日，蒋介石致电丘吉尔表示“感佩”。10月17日滇缅公路重新开通后，运量不断上升，至1941年11月，月运量已达1.5万吨，占当时全国输入货物总量的70%。^④

这时，日本的南进决策已经形成，日本与英美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已无法调和。日军进据越南后，毗邻的云南、缅甸，以及新加坡随时都可能遭到日军袭击。因此，蒋介石数度召见卡尔大使，研议中英军事与经济的切实合作问题。蒋介石在10月31日及11月9日，10天之内两度提出建立中、英、美同盟及磋商英美派遣军事与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第2册，第116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第2册，第117,235页。

③ 《温斯顿·丘吉尔演讲全集》，第6292页。

④ 《现代国际关系史词典》，第732页。

经济使团来华等问题，协力对抗日本。^① 美国虽早已开始声援各国反法西斯战争，但这时尚未摒弃孤立主义的对外政策，故不愿结盟。英国虽不愿与国民政府达成军事与经济合作的方案，但面对与日本在远东终究难免一战这个现实，允派戴尼斯(L. E. Dennys)少将来华商谈中英军事合作办法，并表示愿意继续考虑经济援华。戴尼斯率军事代表团抵重庆后，蒋介石即于 1941 年 2 月 10 日接见他与卡尔大使，强调中英应及早决定军事合作方案，以期有备无患。云南与新加坡在军事上息息相关，一旦日军攻滇，希望驻新加坡的英国空军及时应援，也唯有粉碎日军攻滇，新加坡方能更安全无虞，否则中英军事合作将失去实质意义。卡尔强调英日尚未开战，英军不能卷入中日战争，因而眼下中英军事合作的时机尚未成熟。只有当新加坡遭日军侵犯时，这种合作才能真正开始。^② 这时英国除转让给中国一部分美援武器外，还谈不上制订一项中英军事合作方案。1940 年 11—12 月间，经中英双方多次磋商，中方希望获得平衡基金借款及信用贷款各 1000 万英镑，英方以财政困难为由只同意一半，各予以 500 万英镑贷款。^③ 总之，太平洋战争前中英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未建立起同盟关系。英国虽愈来愈感受到日本的威胁，但又疑虑重重，唯恐公开与中国合作会触怒日本，自己遭殃，因此，实际上对中国抗战仍甚少支持。

1941 年 4 月 13 日苏日订立中立条约，日本北守南进战略已属昭然。国民政府再次向英方强调，云南与新加坡互相援助，应是当前中英军事合作的要务。两个月后，英国远东军总司令波帕姆(Gen Popham)致函蒋介石，说明英国无法对空军援华作出任何确定的承诺。^④ 不过，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为首的代表团与英驻华大使馆军事参赞戴尼斯少将，自 7 月 24 日至 8 月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3 编，第 2 册，第 44—52 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3 编，第 2 册，第 137 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3 编，第 2 册，第 235 页。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3 编，第 2 册，第 15 页。

12日陆续举行了4次中英联合军事行动的磋商会议。国民政府希望英国效法以陈纳德任总指挥的美国志愿援华空军“飞虎队”(亦称美国志愿航空队),派志愿军事人员来华助战。可是,英国政府依然坚持,只要英日尚未开战,英国就难与中国合作抗日,并明确表示,英军不能与中国军队协防云南。经反复磋商,直到8月中旬中英军事合作的僵局才开始稍有松动,双方达成了一些互有协防承诺的初步协议。中英还协议共同保证滇缅公路运输畅通,共同负责修建缅甸八莫至云南保山的公路。^①至于英国空军援华作战问题,始终未达成协议。这些初步协议是中英军事合作起步的标志,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正式结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综观从九一八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0年间,英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和政策,从旁观袒日、避战求和,到明确支持中国抗日,与中国结盟,经历了漫长的变化过程。相当长时期中,它不惜牺牲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满足日本侵略者的欲望,以维护它自身在华既得的权益。直到当日本严重触犯其在远东的殖民利益,与日本的战争难以避免时,英国才彻底放弃其对日绥靖政策,与中国人民一道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历史系)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第2册,第176页。